



思想与文化

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想与文化

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编

顾问 王元化 杜维明

主编 杨国荣

副主编 陈卫平 王家范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旭海~~ 陈平原 ~~陈晓明~~ 姜义华

~~楼宇烈~~ 潘富恩 ~~陈明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与文化.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
文化研究所编.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
ISBN 7-5617-3069-1

I.思… II.华… III.社会科学-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284 号

思想与文化(第二辑)

编 著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 夏 玮 孔祥骅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http: //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3100
书 号 ISBN 7-5617-3069-1/K·226
定 价 17.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文化与现代性

- 《检论》的文化史意义 姜义华 1
- 自由主体与文明国家 (德) 汉克杰 30
- 以史解径
- 章学诚与现代诠释学 王晴佳 41
- 现代性的普世依据: 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与欧洲
- 启蒙思想的真实融会 胡晓明 59

思想与人物

- 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新知识群体 杨国枢 75

中西之间

- 整体史观与弗兰克“新中心论” 王家范 93
-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何以可能
- 李大钊与 J·S·穆勒 董世强 107
- 墨子: 兼爱与后果论 贤·休希斯曼 132
- 东西方文化碰撞: 胡适文学观中的
- 民俗倾向 陈勤建 李小林 152

伦理、宗教与文化

- 道德金律、恕忠之道与儒家伦理 王庆节 178

儒家仁爱观与全球伦理:兼论基督教

对儒家的批评..... 黄 勇 204

基督教和儒家论“罪”与“恶”..... 程庆远 230

宗教、文化的交谈与和谐

——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 顾卫民 243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文化

全球化与儒家文化

——一种可能的未来前景..... 东方朔 251

认同的悖论

——全球化背景下的香港文化身份问题..... 罗 岗 262

哲学与文化

形而上学引论..... 杨国荣 277

文化与现代性

《检论》的文化史意义

姜义华

《检论》系由《馥书》修订增补而成。

《馥书》修订本出版后,在学人中产生很大影响。经过三年禁狱生活,两年多主编《民报》的实践,章炳麟对许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在《民报》停刊以后,他就开始着手再一次修订《馥书》。他在《自定年谱》宣统二年即 1910 年条下即记,在先后撰成《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三书,并撰写《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时,“《馥书》亦多所修治矣”^①。

现存这一手改本由北京图书馆收藏。1974 年 12 月在该馆大力支持下,我将这一手改本与《馥书》原刊本及其后出版的《检论》逐篇逐字作了核对、校勘。稍后,将相关笔记及《馥书》校改本借予汤志钧,蒙他摘引入《章太炎年谱长编》,见该书上册第 339 页至第 343 页。由于笔记上有些字句比较潦草,或用速写方式,该书在摘引时不免发生若干讹错。今据原笔记,将手改本情况介绍如下:

手改本是以《馥书》东京翔鸾社“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七年秋七月再版”本为底本,版权页注明此书初版时间为“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五年夏四月出版”。初版时间是 1904 年,这一再版本出版时间是 1906 年。

手改本的构想,是在《馥书》东京版基础上作若干充实、调整,对原有论文作若干改动。

第一篇《原学》，有改动，后又全删；

第二篇《订孔》，作了较大修改，但与《检论》所收《订孔》上、下不同。值得注意的修改，一是将论荀子“其正名也，世方诸认识论之名学，而以为在琐格拉底、亚里斯大德间”一段，改为：“其正名也，与墨子相扶持。有所言缘，近浮屠之义。及道家有庄生，始为《齐物》，又远出孟、荀上。”这反映了他研究墨子、因明学和《齐物论》的心得。二是将“况于孔氏，尚有踊者，孟轲则蹶矣，虽荀卿却走，亦职也”，改为：“况于孔子，尚有踊者，孟、荀则逡遁矣，庄周勿能与并持世，亦职也。”以下删去原文中注释及“名辩坏，故言淆；进取失，故业堕”一段，增加一段新的论述：“且古者世禄，子就父学为畴官，故学有称家。……九流称家，已非畴官之学矣，然名犹袭其故。……自老聃写书征藏以诒孔子，然后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诸书复稍稍出金匱石室间。民以昭苏，不为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堕。不曰贤于尧、舜，岂可得哉？”三是于原文结语“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下，新增一段：“书布天下，孔子之功，其后有刘歆、冯道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史乘亦绝，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民间独有五经、《论语》，犹非师授不能得，自余竟无传者。……向、歆理校讎之事，书题杀青，复可移写赁鬻，后汉之初，王充游洛阳市肆，已见有卖书者，……然以钞撮重繁，犹多窒滞，及冯道为镂版之术，而负贩益易矣。……三君学术道行固有高下，或乃山头井底不足相喻，然其发舒民智一也。”

《订孔》之后，新增一组专论儒家的目录：《原儒》、《原经》、《六诗说》、《小正大正说》上下、《八卦释名》、《孝经说》。这一组文章，前三篇稍后收入《国故论衡》，后几篇以后收入《太炎文录初编》。

原《儒墨》，改名《原墨》，改动后，与《检论》所收录者相同。

原《儒道》全删。目录列入《原道上》、《原道中》、《原道下》，后来收入《国故论衡》。

《儒法》改名《原法》，变动较大，而又不同于《检论》所收录者，其中论法律缘起与沿革尤值得注意：

管子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臣七主篇》）又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七法篇》）此则法以明刑，今之律矣；律以定分，今之格矣。……科条不厌其繁，著于传记者，律有甲、乙、丙，始李悝；令有甲、乙、丙，始周威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异道家、儒家所为，则佞之徒也。何者？法律繁苛，未足以饶民；饶民者，在亿察无征之事。汉文帝时，有郿侯之律，益以叔孙通傍章十八，法益碎矣。还有一段，专论法与德及礼的关系：

法之弊者，喜舍事状而占察人之心术。反唇有诛，腹诽有刑，教天下谄，为人主一己之便。……藉令为民德计者，乃者长老师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非法令所能就也。立法之意，止于禁奸，使民有伪行而已。欲以法令化民，是闻槩括足以揉曲木，而责其生榘桷聆风，民未及化，则天枉者已多矣。

《原法》之后，目录中又增《原名》、《原五家》、《正见》三文，当即稍后收入《国故论衡》的《原名》、《辨性》上下及《明见》。

《儒侠》略有删节，与《检论》所收者不同。《儒兵》改为《原兵》，改动较大，但较《检论》中《本兵》简略。

《原兵》之后，目录中增加一篇《第七十子》，该文未见。以上一组文章，论先秦诸子。

《学变》前增加《征信论》上下篇及《秦献记》，由此开始论历代学术沿革。后来，《征信论》与《秦献记》均收入《太炎文录初编》。

叙述历代学术沿革的《学变》、《学蛊》、《王学》、《颜学》、《清儒》、《学隐》等文，大多有所改动，与《检论》亦不全同，甚至差异较大。《学变》与《学蛊》之间，曾插入一篇《思乡愿》，这一篇后来也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学蛊》修改稿，其后《检论》则舍弃未用。

《订实知》与《通谏》，改成《通谏下》与《通谏上》，后又改题为《非谏下》与《非谏上》，增删幅度都很大，后来，在《检论》中，与原《原教

下》、《封禅》、《河图》共五篇合并为《原教》一文。

《原人》、《序种姓》上下篇、《原变》、《族制》及其附录《许由即咎繇说》这一组文字,改动最大的是《序种姓》上篇,删去了有关中国人种西来说的全部内容,改而论证“黄帝之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北底雍、凉则附羌,南抵滇、黑水则附荆”,“虽神农,亦产楼兰、西羌间”。《族制》及其附录则全删。其余修改不多,与《检论》所收录者相同。

《民数》一文,增补两则注,正文中史实亦有所充实,和后来《检论》所收录者相同。

《封禅》作了很大修改,后来改题《议封禅》,最后全文删去,成为《检论·原教》中一节。《河图》有个别词句改动,后来也成为《检论·原教》中一节。

《方言》在叙述各地方言声韵变化轨迹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删去先前一些论断;在方言种类方面,删去湖南一种,又增加一段,论南北朝时方言变化情况,与《检论》所录《方言》正文相同。《订文》及所附《正名杂义》俱有较多增删,凡直接引述斯宾塞尔、亚诺路得等人论说者,尽量删去;增加若干论述,使所论更为准确。《检论》所录此文,与此相同。《述图》增加两段论述、一则注,与《检论》所录者相同。

《公言》,全文删去。

《平等难》,目录中题目未改,书中题目改成《商平》,内容亦作大幅度修改。本篇应是章炳麟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时,在《馗书》原手改本上改定。《馗书》手改本中其他还有若干篇,如《明农》、《定版籍》、《订礼俗》、《相宅》、《地治》、《消极》等,也是如此。除去这些文章直接涉及辛亥革命后事件,因而可断定是在被禁期间对《馗书》作进一步修改时定稿外,还有一些文章,显然也是这一时候方才决定如何处理。最为明显的就是《平等难》之后的《明独》与《冥契》,手改本目录中保持未动,《检论》中则删去,即是被囚禁时进一步修订《馗书》并编为《检论》时决定的。

《馗书》自《通法》至《定律》一组文章,改动幅度较大。《通法》充

实了古代政法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官统》上中下三篇,目录中存《官统上》,《官统中》改为《官统下》,注明该文“即《官制索隐》”;《官统下》删去,改为《五术》一文。《官统上》有若干重要修改,但是,在北京被囚期间进一步修订《狱书》时,他又有了新的想法,在书中将篇题与内容全部删去,《检论》中《官统上》为新撰。《官统中》改作《官统下》时,充实了约三分之一内容,修改后文字与《检论》所收《官统下》相同。《官统下》题目改成《五术》,改动幅度较大,和《检论》所录者同。《官制索隐》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商鞅》篇增删修改较多;《正葛》在目录中改为《评葛》,书中题目改作《议葛》,全文又复被删。《检论》中《思葛》前半篇全部新撰,后半引用《正葛》主要内容。《刑官》与《定律》俱有字句修订,同于《检论》所收;而《刑官》目录之后,原拟增添《说刑法》、《五朝法》二文,《检论》中均未收,《太炎文录初编》则收入《五朝法律索隐》及《说刑名》。

《不加赋难》以下一组论经济的文章,《不加赋难》题目改作《谴虚惠》,《明农》、《禁烟草》、《定版籍》与《制币》题目均未变。但《检论》中未收《禁烟草》,《制币》全部重写,题目改为《惩假币》。其他各篇手改本中所改与《检论》相同,皆为被囚禁时改定。

《弭兵难》目录中删去,改成《代议然否论》,但书中《弭兵难》与《经武》均保留,《检论》则皆未收。《代议然否论》则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

《议学》仅删去文末一个注。《原教》上下目录中均保留,书中《原教上》全删,《原教下》作了大幅度修改,《检论》中《原教》即此篇与《封禅》、《通谿》、《河图》、《订实知》合成。这两篇当是被囚时所改定。《争教》有改动,与《检论》所收录者又不同,当是1910年时所改。《忧教》,目录中保留,书中加了长注,后来在《检论》中又经增删,并入《争教》文中。《订礼俗》手改本中作了多处增补,收入《检论》时,又有增补,是知该文两次作了修订。《辨乐》正文文字略有修订,较《检论》多一长注,是知该文亦是两次修订。

《相宅》与《地治》,俱与《检论》相同,应都是在北京囚禁时改定。

《消极》，在目录中改成《消道》，书内又改成《无言》，此当为北京被囚时所改。《消道》之后，目录中原加一篇《告王鹤鸣》，当即《太炎文录初编》中《与王鹤鸣书》。

《尊史》以下论史文章共八篇，目录中俱未改，只在《哀清史》后增加《国风》、《侘诗》、《伤徐锡麟》、《告刘光汉》四篇文章目录，《解辨发》下增加《志六国》与《告刘揆一》两篇文章目录。在书中，《别录甲》题目改成《杨颜李别录》，《别录乙》题目改作《许二魏汤李别录》。除《征七略》与《解辨发》未作修改外，其余各篇都有局部修改。后来，《检论》未收录《解辨发》，其余各篇与《馥书》手改稿本相同，表明它们俱改定于北京被囚禁时。

北京图书馆所藏《馥书》手改本，绝大多数文字修订于1910年前后，少量改定于囚禁于北京期间。1911年11月回国后，忙于政治活动，《馥书》修订工作显然停了下来，原书置于篋中。1913年他北上向袁世凯抗争时，书稿未带在身边。1914年迁居北京钱粮胡同后，他开始考虑继续完成此书修订工作。8月11日，他致书龚宝铨，要他将“自著《馥书》改削稿本”带到北京。8月20日，他再次致书龚宝铨说：“唯篋中尚有改定《馥书》，未能惬意，今欲重加磨琢，此稿亦望先期带致也。”9月3日，他又一次催促龚宝铨：“篋中尚有《馥书》改本，亦望速记，拟再施笔故也。”10月15日，他更急切地致书龚宝铨：“唯《馥书》改本一册，尚未大定，即可钞录大略，原本俟德玄来京时可速带上，拟再有增修也。”^②这几封信，反映了章炳麟对原改削稿本是如何重视，而重加磨琢、再有增修的心情是如何迫切。

从《馥书》改削稿本可以看出，起初，章炳麟仍是在《馥书》原本上继续修订，但是，很快他就发现，《馥书》原先架构已不足以容纳他这时对于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终于决定对《馥书》作全面重构。这也就是他在自定年谱1914年条下所说：“余感事既多，复取《馥书》增删，更名《检论》。”^③感事既多，是了解《馥书》改定为《检论》的关键之所在；完成改定，则在1915年4、5月间。^④

1915年5月《时报》刊登的《章氏丛书》广告中特别说明：“《馥
6 / 思想与文化(第二辑)

书》一种,先生改名《检论》,大加修改,与初印本绝异。”^⑤绝异,就不是一般性差异,或仅在篇幅上、文字上有些差异,而是在基本意图上两书明显不同。这从《检论》的取名及《检论》内容的构成,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为什么取名《检论》?“检”字含义,在《文始》七有一段专门论述:

《说文》:“桺,檻也。以臧虎兇。古文作𡩂。”此初文也。

旁转谈变易为檻,桺也。……檻作喉音对转宵草乳为校,木囚也,其不系囚执者,𡩂亦引申草乳为闾,门旁户也。为间,开闭门也。为桺,检桺也。桺旁转草为检,书署也。《地官·掌节》注所谓斗检封,谓于两相合处印封之也。《法言》云:“蠢迪检桺。”检对转宵亦为校,通言检校。……检桺之义又草乳为敛,收也。……检校之义又草乳为谗,问也。即今考验字,对转宵变易为核,实也。考事而笮遯遮其辞,得实曰核。^⑥

检字,溯源于桺,“檻也,以臧虎兇”,和章炳麟身被幽囚、一切政见被严禁发表的境遇完全吻合。检,与桺相连,又有规矩、法度、矫正之意。《汉书·扬雄传》:“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桺。”颜题古注:“蠢,动也。迪,道也,由也。检桺,犹桺桺也,言动由检桺也。”^⑦检与校相连,意为查核;检与敕相连,意为整饬;检与详相连,意为考核审定;检与式相连,意为法式、法度;检与核相连,意为考查核实。检字在这里都包含有提供一种准则、坐标的意思。检字,作为“斗检封”,指文书完成以后,装囊加封,于封口加盖印章,“于两相合处印封之”,具有全部完成、待他人启封之意。《馗书》书名更名为《检论》,当包含着这多层意思在内。

《馗书》更名为《检论》,原因在于两书立意有着重要差异。《馗书》是要颠覆传统的思维范式,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制度、传统文化。而《检论》的立意,重点显然已不是颠覆,而是为如何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建设一种结构,树立一个标准。这清楚地表现在《检论》的分卷与篇目中。

《馗书》不分卷,《检论》分卷。从《检论》的分卷及篇目设置与增删中,可以清楚看出作者新的意图。

《检论》共分九卷。

卷一,共四篇文章,为《原人》、《序种姓》上下、《原变》,据《馗书》四篇同名文章修改而成。这是研究中华民族的缘起及其演变。与《馗书》相比,最重要的改变是从沿袭西方学者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转变为反对中国人种西来说。

卷二,共十篇文章,另有附录两篇,其中《辨乐》、《尊史》、《征七略》为《馗书》旧文,有所修订,其余各篇《易论》、附《易象义》、《〈尚书〉故言》、附《造字缘起说》、《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俱是新撰。这一卷文章,是专门讨论中华文化原典,亦即中华文化起源。《馗书》基本上未触及这一问题。

卷三,共九篇文章,另有附录两篇。《订孔》上下、《原墨》、《原法》、《儒侠》、《本兵》、《学变》俱据《馗书》旧文改订,《道本》、《道微》及附录《汉律考》、《黄巾道士缘起说》俱新增。这一卷文章,讨论先秦诸子和汉代思想学术演变状况,和《馗书》相关部分比较接近,但论述更为全面,立论也更为坚实。

卷四,共八篇文章。起首《案唐》与《通程》俱是新撰,《议王》与《馗书》及手改本《王学》均不同,实为新撰。《许二魏汤李别录》、《哀焚书》、《正颜》、《清儒》及《学隐》俱由《馗书》旧文修订,《正颜》在《馗书》中题为《颜学》。这一卷,论述汉魏以后中国学术、思想、文化演变过程。

卷五,共四篇文章,另附录一篇。《民数》、《方言》、《订文》及附录《正名杂义》、《述图》,俱据《馗书》旧文增删修订,考察中国人口、语言、文字、图像,这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及中国文化得以形成和传播的主要工具。

卷六,共五篇文章。《正议》为新撰,《商平》据《馗书·平等难》改写,《原教》由《馗书》中《原教下》、《封禅》、《通谏》、《订实知》、《河图》五文合并改定,《争教》与《订礼俗》据《馗书》同名两文修订而成,《馗

书·忧教》全文并入《争教》。这一卷,研究共和、平等一类人们的日常思维,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是中华文化中最具大众性、世俗性的部分。

卷七,共十二篇文章,专论中国制度文化。其中《通法》、《官统》上下、《五术》、《刑官》及《谴虚惠》、《相宅》、《地治》,讨论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律制度;《明农》、《定版籍》、《惩假币》,讨论中国经济制度;《无言》,讨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得失。这一卷文章,除去《官统上》和《惩假币》为新撰外,其余各篇,俱据《馗书》原文改定。《五术》原为《官统下》,《谴虚惠》原为《不加赋难》,《无言》原为《消极》,其余各篇使用原题。

卷八,共四篇文章,附录一篇。《杨颜钱别录》,《馗书》中原为《别录甲》;《杂志》与《哀清史》与《馗书》旧文同题;《对二宋》系新撰;附录《近史商略》也是新撰。这一卷论民族冲突中特别是清朝统治下人物行事。

卷九,共七篇文章,附录一篇。除《商鞅》、《正葛》系据《馗书》旧文修订外,《非所宜言》、《伸桓》、《小过》、《大过》及《近思》,附录《光复军志序》俱为新撰。这一卷结合历史和辛亥革命成败历程的回顾,对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检论》上述九卷六十二篇正文与七篇附录的构成,非常醒目地表明作者试图对中华文化作一总检核。1903年章炳麟因《苏报》案被羁囚于上海时,曾感叹说:“上天以国粹付余,……岂直保守残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正是这样极为强烈的民族文化“恢明而光大之”的使命感,使他悲叹,在他牺牲之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绪统”,为此,他深为自责:“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在编定《检论》之前,1914年5月决定以绝食向袁世凯抗争时,在给汤国梨的家书中,章炳麟又一次感叹:“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⑧在给龚宝铨的诀别信中,他特别写道:

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

《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虽从政蒙难之时，略有燕闲，未尝不多所会悟。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⑨

“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新的会悟不能著之竹帛，将“遗恨于千年”；“中夏文化亦亡矣”；这种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感，是章炳麟修订《书》编定《检论》的最大的精神动力。要了解《检论》的谋篇布局及其内容实质，也应当由此入手。

《检论》将研究中华民族起源及其演变的四篇文章列为第一卷，显示了章炳麟仍将民族主义列为首要诉求。《原人》中所说的“一切以种类为断。是以综核人之形名，则是非昭乎天地”^⑩，作为《检论》首篇文章的总结论，贯穿于《检论》全书，成为作者检核中华文化的总纲领。卷四《哀焚书》重申：“今夫血气心知之类，惟人能群。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⑪卷八《对二宋》中专门记述作者同宋恕的一场争论。宋恕认为，中国应以立宪为本，“诚欲尽善，宜以大议属之庶人，则天下骥应，湔其旧污。所谓宪政者，如执辔然，总御不纷，而骝聊如舞焉。此所以为易简也。”^⑫章炳麟反驳说：“今中夏欲完强如东国者，非唐慕之也，又不可苟效宪政以迎致之，莫若理其本。理其本者，当除胡虏而自植。吾夏人宗国不隳，则耻以鬻降为宠，然后举不失劳，官不失材，使罗之善柔巧宦者，无敢徼幸以致僭石。其意者骄泄渐除，而勤业稍众矣。今是言宪政者，非诚有所识于本株也。”^⑬章炳麟通过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实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是靠侈言宪政，而是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辅万物之自然，以百姓心为心，对旧法素俗进行切实的改革。他批评高言宪政者：“今议者多大声色，侈章奏，以自贾炫，徒言法敝，不课其是非。顾未有一言以攻恶吏幸臣，竞扇宗羲治法之虚言，而以荀卿治人之文为讳。此徒见其谄谀贵势，不诚有救国心也。”^⑭倡导民族主义，目的是要借此扫除中国振兴途中的主要障碍，即“狙习为奸，苞苴上流”的旧官僚机

器。他就此写道：“今不课吏人贞邪，徒曰立宪可以定之，建议可以已之。此所谓以《孝经》治黄巾也。是故处今之世，不诛鉏旧吏，去其泰半，其它不慢。然是又非习常所能就也，须于光复则大黜之耳。不戮其人，纵令立法踴于日本，终不可以为善国矣。”^⑤

近代中国，由于自然经济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占居支配地位，统一的国内市场远未形成，在国际竞争中缺乏必要的经济实力，文化的民族主义便远远凌驾于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政治的民族主义之上，而特别活跃。《检论》对于中华文化的总检核，正是从民族命运的兴衰着眼的。《检论》因此也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一部代表作。

在追溯中华文化源起时，《检论》与《馗书》相较，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对儒家经典及孔子本人思想由贬转而为扬。《订孔下》曾特别述及作者认识上的这一重大转变：

往时定儒家，莫若孟、荀。私以《论语》晦昧，《三朝记》与诸告飭，总纪经记，辞义映如也。……怀是者十余年，中间颇论九流旧闻。上观庄生，为《齐物论释》，又以闲暇，质定老聃、韩非、惠施诸书。方事改革，负襟东海，独抱持《春秋》，窥识前圣作史本意，卒未知其道术崇庠也。

以炎、黄、訾、尧之灵，幸而时济，光复旧物。间气相捐，逼于舆台。去食七日，不起于床，赝然叹曰：余其未知姜里、匡人之事！夫不学《春秋》，则不能解辩发，削左衽；不学《易》，则终身不能无大过，而悔吝随之。始翫爻象，重籀《论语》诸书，睟然若有寤者。……上观《周易》，物类相召，势数相生，足以彰往察来，……洋洋美德乎！诚非孟、荀之所逮闻也。诸所陈说，列于《论语》者，时地异制，人物异训，不以一型錙铸，所谓大道固似不肖也。^⑥

先前认为孔子道术远不及孟、荀；《国故论衡》中还评价《春秋》言治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而在被袁世凯囚禁期间，特别是在绝食七天之后，对于《春秋》、《易》、《论语》都有了新的评价。《订孔下》中这一段话对于《春秋》、《周易》和《论语》的

评价,否定了《彖书》及《国故论衡·原经》中原先的评价。对于《周易》及《春秋》的评价,还更具体地表现在《检论》卷二《易论》、《春秋故言》等文中。

《易论》论定:《易》“六十四序虽难知,要之记人事迁化,不越其绳,前事不忘,故损益可知也。夫非讖记历序之僭。”如六十四卦中乾、坤二卦以下屯、蒙、需、讼、师、比、履、泰、否九卦,便记录了人类由草昧渔猎时代一步步走向建立国家、以类族辨物的历史过程,“此九卦者,生民建国之常率,彰往察来,横四海而不逾此。”^⑩

《易论》特别关心宇宙运动的一般规律。作者认为,乾元恒动即今所谓永动力,坤元恒静即今所谓永静力,“群动本无所宗,……群动而生,剝溢无节,万物不足供其宰割,壤地不足容其肤寸,虽成既济,其终犹弗济也。”^⑪正是在绝食期间,深入思考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他对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将产生,从宇宙到人类,将永远处在矛盾运动之中,有了新的理解:

章炳麟曰:《易》本衰世之意,时乱故得失彰。……光复以还,绝世未得继兴,青泽未得下究,诸志士献民,生存未得相廷劳,死亡未得相吊唁也,而逋寇尚有禄胙,庇其族姻,向之降虏,犹持权藉,蛇肆不衰。夫成败之数,奸暴干纪者常荼,而贞端扶义者常踬,……由是言之,“既济”则斃,“未济”其恒矣!^⑫

《春秋故言》,除去重申过去他一直所坚持的《春秋》只是往昔先王旧记,年事相系,为百世史官宗主,而不可能是为汉制法等论点外,一是进一步强调“国无史则人离本,……史亡则国性灭,人无宗主,沦为裔夷”;二是突出了“《春秋》乐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性,……为中国存种族,远殊类”,树建了中国民族主义传统。^⑬这也就是章炳麟所说的“不学《春秋》,则不能解辨发,削左衽”。

然而,尽管《检论》确认《易》、《春秋》、《论语》识见高过孟、荀,章炳麟仍反对因此而将孔子及儒家经典神化。《订孔上》重申:“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继志述事,纘老之绩,而布彰六籍,令人人